

我们舍弃那种以各级党政机关作为各大类共性的分类方法，而在军事、经济、工交、财贸、科学文化、文艺、教体卫等大类下分设“××战线政治工作”与“××业生产（业务）管理与建设”两大部分，然后再按主题设置类目；而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中国军事三大类中以工作范围的主题确定类目；在外交、国际两大类中以国家为对象确定类目，这样就使类目的确定和动态资料内在联系规律大致吻合。

归纳上面的论述，我们的主要论点是：社

会主义时代前的分类法“三性”的关系是主次关系，而社会主义时代的分类法“三性”的关系可能而且应该是辩证关系。我们在编制分类法时一定要重视这个特点，周密研究“三性”相互间的关系并尽量使之和谐完善，这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分类法的“三性”牵涉到许多理论问题，我们限于政治、科学和文化水平，再加上实践经验很少，因此，对许多观点的论述很难深入，错误更在所不免。这些都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浅谈《图书馆学辞典》

张文彬

自从我参加图书馆工作以后，由卢震京先生编辑、刘国钧教授校阅的《图书馆辞典》，一直是我日常工作中常用的参考工具书之一。然而，就是这部辞典，在它刚刚问世不久（1958年9月，商务出版），却引起了一场风波，有组织的批判文章，抡起大棒向卢先生及这部辞典打来，就连校阅者也未幸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告诉我们：《图书馆学辞典》不是“一株大毒草”，它是我国在图书馆学辞典方面具有相当参考价值的工具书。它不但没有“给我国图书馆界带来恶劣的影响”，相反，却给我们这些图书馆工作人员带来不少方便。过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当推倒，卢震京先生的劳动应当受到尊重，《图书馆学辞典》应当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卢震京先生长期从事图书馆工作，在抗战以前就编写了一部图书学大辞典，但国内所存寥寥无几。解放后，随着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特别在1956年党和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以后，图书馆界迫切需

要有关图书馆学、目录学方面的工具书，正如卢先生所说“许多朋友以及图书馆界诸同志”都劝他将图书学大辞典原版重印，以应当前的急需。但卢先生对自己的旧编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他抱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不辞劳苦，利用业余时间，对图书学大辞典进行修订，增加了解放后的新材料，补充了过去遗漏的材料，删去已失时效的材料。但由于篇幅过大，加之时间紧迫，卢先生不得不将原书分别以专书形式出版，《图书馆学辞典》就是原书的第一部分。遗憾的是，在《图书馆学辞典》遭到全盘否定之后，原书的第二、三部分《目录学辞典》和《书史学辞典》，终未能与广大读者见面。

我们说《图书馆学辞典》是一部具有相当参考价值的工具书，首先在于它取材非常广泛。正如刘国钧教授所指出的：“新旧图书馆学著作，不管专书、小册、论文、表格、自著、翻译，也不管铅印、雕版或油印，都在采取之列，真可说是‘博采兼收、搜罗宏富’。各种术语，不管是过时的，现行的，我国固有的，外来翻译的大概都可以在

本书内查到。”作为一部供有关研究人员参考的工具书，取材是否广泛，新旧中外有关资料能否查到，直接影响它的使用价值。在当时，本书基本上能起到上述的作用。如对分类法的介绍，不论是我国解放后各馆新编的图书分类法，还是古代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不论是外国通行的分类法，还是我国近代仿制、改编外国的几种分类法等等，编者都能使读者有个大概的了解。在图书馆技术上，诸如建筑、设备、操作规程、图形式样等，查阅者也能得到相当的满足。但是，批判本书的文章，摆出极“左”的面孔，对搜集我国古代和外国的资料大兴问罪之师，说什么编者通过介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材料来毒害读者。请问，我们的图书馆工作者，如果对祖国的图书馆学遗产、对外国的东西都一无所知，这难道是有益的吗？编者的目光并没有局于一隅，而是大胆地、详细地搜罗了有关中外古今的资料，编为一集，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采用我国古代类书的编纂方法，是本辞典的第二个特点。编纂百科性的辞典的方法，有的收罗各科重要的术语、名词，分条列目，以简明的短文，概括或系统地加以说明；有的汇集各原书的有关材料，加以注释。本书的条目，有的用编者的话简要给予说明，但更多是从原书中采集有关章节，略加剪裁作为释文。为对某词条解释得为完备，编者有时引用几种原书的资料，使之相互补充。如“图书馆”一词，编者就摘引了金天游的《图书馆基本工作简本》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新图书馆的工作与任务》有关章节，概要说明“图书馆”一词的来源、功用、原理，社会主义图书馆与各历史时代图书馆的原则区别。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能较为灵活地处理有关词条，使读者便于检阅原著，作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某些条目的科学含义，在没有定论的情况下，直接摘录各家的说法，更是较为合适。另外，以

编者个人的力量，编纂一部长达百万余字、近二千条目的工具书，要想在短时间内，以系统叙述的方法来完成它，恐怕也力不从心。但是，批判者不问当时的具体情况，不问本书所采用的编辑方法，更不看一些词条的具体内容，一概斥之为“超阶级”的“大杂烩”，实在专横武断。

批判文章对本书所加的另一个罪名，是“毫无用处”、“浪费纸张”。我倒认为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实用性强。大家知道，图书馆工作不但是一项理论性很强的工作，而且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现代化的图书馆，无不日益大量地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图书馆工作上来。因此，要想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不能不注意图书馆工作的科学化和标准化，由于编者深知图书馆技术的重要性，在编纂过程中，并不限于只对词条下定义，而是多方搜求当时通行的以及某些先进的技术资料，并附有实物图形。因而它基本上反映了50年代末图书馆界的技术水平。图书馆的一些管理方法、技术规格、工作条例、注意事项、组织措施等等都在本辞典里得到反映。有些技术资料可以在实际工作中直接采用，不必多费周折，到处访求。

在记载材料方面，编者也有一定的考究。每一条目下，凡是编者能查到的，都列出相应的俄、英、德、法、拉丁等外文名词。解释正文之后，注明该条目应参见某条资料来源何处。附有外文条目，这给懂外文的同志进一步利用有关外文工具书提供了方便。同时中外参证，也能加深对某一条目的含意的理解。条目之间大量运用互见法，弥补了按笔画排列条目的不足，使之相互联系举一反三，具有族性检索的功能。注明资料来源，表明编者治学态度的诚实，尊重他人劳动，同时可以使读者“按图索骥”“追本穷源”作深入研究。

最后，本书正编之后还附有六个很有趣（下转第77页）

有机会与中国图书馆界的朋友们见面感到高兴,并对中国图书馆学会的热情招待表示感谢。

美国图书馆界代表团在京期间,参加了第四次全运会的开幕式,游览了颐和园、香山碧云寺、长城、定陵、故宫等名胜古迹。

美国驻我国大使伍得科克和夫人,在代表团抵京后的第二天晚上,在官邸举行酒会招待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北京图书馆的有关人员表示感谢。代表团在京期间,美国驻我国大使馆文化处一等秘书、北京美国图书馆馆长和专程由香港来京的香港美国图书馆馆长等人随团参加各项参观访问活动。

美国图书馆界代表团九月十八日离开北京,前往西安、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参观访问,于九月底由广州离境回国。代表团离京前,在国际俱乐部举行了答谢招待会,我有关单位六十人应邀参加。

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国人民和两国图书馆工作者的友好往来将会日益增多。美国图书馆界代表团应邀对我国的参观访问,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对于增进两国图书馆工作者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图书馆工作者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上接第61页)

义的材料。如《图书馆学书目解题》、《图书馆工作程序表》、《俄文西文编目简略字表》等。由于这些材料的内容相当完备,它不仅是当时图书馆学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人员难得的参考资料,而且目前还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欲知56年以前我国刊行的图书学著作及其基本内容,在本书附录材料中基本上能得到圆满的答复。还有西文、俄文编目简略字表,更是图书馆编目人员经常利用的材料。这些附录材料为正编增色不少,可以说它是正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总之,本书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使我深深感到:“大毒草”的帽子完全扣不到它的头上,要全盘否定它,是没有令人信服的根据的。特别是在我国图书馆事业遭到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之后,使我们更加懂

得,二十一年前卢震京先生的辛勤劳动是何等难能可贵!他以满腔的热情为繁荣祖国的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而编纂工具书,却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攻击,这种破坏学术民主的深刻教训,我们应永远记取。

当然,本书不是没有缺点,这在刘国钧教授的校后记中,基本上都很中肯地指了出来,作者在前言和说明中,大也都感觉到了。如有些材料过于陈旧、术语尚未全完统一,文体不纯,由编纂方法所带来的缺乏必要的评论,作为标准的名词术语或图书馆工作的指南尚嫌不足等等。这些缺点完全可以在以后的修订中得到改正。我们衷心希望像《图书馆学辞典》这样的工具书能组织修订再版;《目录学辞典》、《书史学辞典》能促其早日问世。如果这样,无疑将是我国图书馆界在向四化进军道路上的喜事。